

ZHONGGUO NONGMINGONG YANJIU



中国“农民工”研究

(1984 — 2014年)

王春雷 著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3072)

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
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区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联合资助项目
武汉商学院资助出版项目

ZHONGGUO NONGMINGONG YANJIU

中国“农民工”研究

(1984—2014年)

王春雷 著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工”研究(1984—2014 年)/王春雷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64-1690-5

I.中...

II.王...

III.民工—研究—中国—1984—2014

IV.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5061 号

中国“农民工”研究(1984—2014 年)

出品人 方 平

责任编辑 刘书慧

装帧设计 牛 红 何亦明

责任校对 刘慧芳

责任督印 张遇春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印 刷 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地 址 咸宁市桂乡大道 8 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1690-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027-83637493 进行调换)

序

放在我案头的是一部将要出版的关于“农民工”研究的书稿——《中国“农民工”研究（1984—2014年）》，书稿的作者王春雷博士请我为本书写上几句话，我十分高兴地应承下来。原因有三：

其一，这部书是王春雷博士治学道路上的又一新硕果。他关注农村，研究“农民工”，对于他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成就，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视为我自己的进步和成就。我始终认为，人生如同登山，越是接近顶峰亦越为艰难，只有不断迈出新的一步，才有可能攀上顶峰，观赏到无限风光；做学问如同泅渡，有智有勇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每取得一点成绩都应成为坚持泅渡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因此，对于王春雷博士所取得的成就，我作为师者与长者，唯有鼓励与支持。

其二，书稿研究对象是“农民工”。举目望世界，“农民工”为中国所独有，“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围绕着“农民工”所产生的问题，都将影响到中国改革、农村建设、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等重大事业。也许因为我个人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史，所以我十分关注、关心和关切“农民工”及“三农”问题。在我这里，关注、关心和关切“农民工”问题是我关心中国改革、关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自然，对于王春雷博士选择“农民工”作为关注和研究对象，我是非常赞同的。

其三，王春雷博士对“农民工”的关注与研究“正未有穷期”。即将出版的这部《中国“农民工”研究（1984—2014年）》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期望，今后学术界涌现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我祝愿“农民工”问题将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得到全方位、实质性、高水平的解决。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在传统的经济制度与体制下，农民安土

重迁，面朝黄土背朝天忙于土里刨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正如孔子所推崇的那样“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在这种状态下，“农民工”是无法产生的。改革开放使农民解放思想，摆脱束缚获得了自主流动的权利，使追求财富的欲望有了实现的途径，最终在市场经济大潮的鼓动下，产生了中国“农民工”群体。我认为，“农民工”的产生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一大“变”。

在中国，“农民工”应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农民工”是时代的产物，并不会永久存在。在未来的某一时段，随着“农民工”融入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表现），转化为市民，“农民工”必将以一种历史的过渡性产物而退出历史舞台。这种现象的发展趋势已显见于两代“农民工”的差异中。上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策，他们身在城市心系农村，务工收入仅仅是他们弥补农业收入不足的手段；而新一代“农民工”有着比他们父辈较高的文化和更高的人生追求。在经济上，相比于上一代“农民工”“锄头+务工薪水”的收入模式，新一代“农民工”已不太在意农业收入的多寡了，“务工薪水”已成为新一代“农民工”谋生的主要经济方式。在观念上，新一代“农民工”已不太在意“土地”了，失去了第一代“农民工”对土地的眷恋之情，认为种田太苦、收入太少，当农民太不体面。在生活上，新一代“农民工”通过“务工”长久定居在城市。享受城市现代文明正成为他们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的愿望，他们将毫不吝惜地抛掉“乡下人”“农民工”的帽子。

当今中国，一方面是“农民工”想尽快融入城市，一方面是中国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重要表现是人口的城市化。“农民工”的城市化不仅使农民融入城市，改善自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活环境，转变自身观念，同时也必将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做过一个测算，每个“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化）所需要的公共支出成本约在8万元，以此推算，全国1.59亿外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支出成本将会直接拉动13万亿元的内需。

现实中的“农民工”是横跨农村与城市的“双栖人”。他们是农民，但又不是纯粹的农民；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又不完全属于城市；他们看似有“家”，但实际又很难赡“家”。上有老人难于赡养，下有子女留守乡间。他们兼具两种职业（工、农）和两种社会身份（城里人、乡下人）。社会更多的是注重

其“劳动能力”而不是赋予他们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他们被称为“弱势群体”，权利不被保障。他们必须以自己羸弱的身躯承受各种难以承受的不利结果，众多“农民工”问题由此产生：我同情“农民工”为保工、讨薪而跪倒在强势老板面前；同情为证明职业伤害的尘肺而自剖以求公道；同情女性“农民工”在职场所受的欺凌；忧心于“农二代”的农村守望及其教育；担忧大量“农民工”进城所留下的鳏寡孤独残能否肩负得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我常常在想，10年、20年以后，谁来当农民，谁来从事农业？

中国的改革自农业始，中国的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也是在“农民工”的肩膀上开始的。改革开放30多年，使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不能忘记农民和“农民工”。在中国，一定是农民富则国强，农业丰则基础稳，农村和谐则社会安定。

“农民工”问题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好，但又要经历一个持久而复杂的过程，其解决的妙方在于改革的深化。所以，任何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及实践都应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郑重推荐王春雷博士这部《中国“农民工”研究（1984—2014年）》专著，希望能够对关注和研究“农民工”这一中国特殊群体的读者有所帮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目录

导 论	1
一、“农民工”城市化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
二、“农民工”城市化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8
三、“农民工”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14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19
 第一章 “农民工”的就地转移——职业非农化的路径探索（1984—1991 年）	21
第一节 社队企业——农村工业化的最初尝试	21
一、社队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22
二、农村工业化取得的成就	30
三、“职工”管理与收入分配	39
第二节 就地转移——职业非农化的路径探索	43
一、乡镇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43
二、职业非农化取得的成就	45
第三节 就地转移对农业人口非农化的贡献	54
一、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54
二、产生并洗礼了中国首批“农民工”	62
第四节 “农民工”就地非农化转移的局限性	65
一、农村工业化早熟性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65
二、地域分散化对产业集聚的制约	66
小 结	68
 第二章 “农民工”的异地转移——就业地域城市化（1992—2003 年） ...	70
第一节 异地转移“农民工”的基本特点	71
一、“农民工”的流动格局	72

二、“农民工”的年龄与性别	78
三、“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行业分布	80
第二节 “农民工”的城市工作与生存状况	87
一、“农民工”的城市工作状况	87
二、“农民工”的收入支出状况	91
三、“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96
四、“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冲突	103
第三节 “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缺失	109
一、失去劳动保护的“裸人”	109
二、社会基本保障对“农民工”的排斥	113
第四节 “农民工”地域城市化的制度性障碍	114
一、国家对“农民工”政策取向的演变历程	114
二、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自由迁移的影响	119
三、二元体制下政策公允性的欠缺	126
第五节 “农民工”地域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31
一、“农民工”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132
二、“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133
第六节 “农民工”地域城市化对家庭及农村的影响	141
一、地域城市化对传统家庭的解构	141
二、地域城市化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150
三、地域城市化对现代农业的影响	163
小 结	167

第三章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身份趋于市民化（2004—2014 年）

.....	170
第一节 “农民工”城市融入阶段新特点	172
一、“农民工”群体出现了新变化	172
二、国家“以人核心”城镇化思想的确立	191
第二节 “农民工”城市身份的逐步市民化	192
一、“农民工”身份市民化成为国家政策导向	194
二、“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政策探索	197
三、“农民工”身份市民化政策的渐进性	200
第三节 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206
一、第二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207
二、第二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211

三、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216
第四节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	218
一、“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障碍	218
二、“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障碍	220
三、农村资产流通性的障碍	221
小 结	223
 第四章 中外农业人口城市化的道路与启示	225
第一节 中国农业人口转移的历程及特点	226
一、中国农业人口转移历程的回顾	226
二、中国农业人口转移的特点	227
第二节 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人口转移的不同道路	229
一、发达国家	229
二、发展中国家	231
三、新兴国家和地区	233
第三节 中外农业人口转移道路的比较与启示	234
一、农业人口的转移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	234
二、土地分配模式直接影响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	235
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是影响农业人口转移的关键因素	237
四、农业人口的转移应与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相适应	238
小 结	238
 结语 中国“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发展演变的理论反思	240
一、从农民到市民，是城乡两部门劳动力供求关系博弈的过程	241
二、从农民到市民，国家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	242
三、从农民到市民，是城乡二元体制逐渐解体的过程	245
四、从农民到市民，是城市化从民间推动到政府主导的过程	247
 主要参考文献	250
一、统计资料	250
二、国内文献	251
三、国外文献	263
 后 记	265

导 论

一、“农民工”城市化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 研究的背景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之路。国家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① 李克强总理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② “推进城镇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现代文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推进城镇化，摆正立足点、出发点非常关键。要立足于人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外来人口的本地化；立足于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③

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核心问题是人的城镇化。目前城镇化中，中国“农民工”是个绕不开的群体，“农民工”问题也是城镇化发展一个绕不开的话题。2014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如何实现“农民工”城市身份的转换，使他们从一个农民身份的打工者，顺利实现市民化，可以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福利待遇，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且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既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应有之义，也是其核心所在。以人为本，使城镇化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在我国的城镇

① 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人民日报》2014年3月17日，第1版。

② 赵婀娜：《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就施政目标回答本报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2版。

③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宏观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

化建设中，曾一味强调“农民工”的劳动力要素价值，忽视了其生存与发展。^①“先治坡，后治窝”是这一思维的典型写照，然而这种思维不具有永久的合理性。“重用轻养”“只用不养”^②，“经济接纳，体制排斥”，这种不可持续的“农民工”政策，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据2013年统计，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3.7%，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则只有36%左右。^③换句话说，有约17.7%的中国人口，常住城镇却享受不到城镇的基本福利待遇。“农民工”的“半城市化”^④、“伪城市化”^⑤直接制约了中国城镇化发展。

至此，中国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农民工”的社会问题，一个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问题，在“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理念和要求上实现了对接。社会问题和发展问题矛盾的聚焦点落在了“农民工”身上。“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必将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

“农民工”是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相伴而生的，“农民工”问题更多的是“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很多问题都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政策有关。“农民工”往往是“经济上参与城市化”“体制上排斥于城市化”，是城市人口统计上的“城市人口”，又是基本公共服务上的“非城市人口”。这种城市化的排斥性，又根源于中国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因此，“农民工”完全城市化之时，也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彻底瓦解之日。

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中，如何更好地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解决，如何更好地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本研究成果，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大视野下，对中国“农民工”从1984至2014年的城市化发展历程进行研究。本研究从“农民工”的职业非农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市民化三个阶段三种状态进行了横向的全面研究；在研究“农民工”的摇篮——乡镇企业时，对其前身——社队企业进行了追

① 单永旭、钟志明：《建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视野》2013年第4期。

② 董峻：《解读“八连增”》，《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5日，第1版。

③ 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人民日报》2014年3月17日，第1版。

④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⑤ 文贯中、熊金武：《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符合中国国情吗——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和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的历史比较》，《城市规划》2012年第4期。

溯,进行了纵向的深入研究。纵横向交错,使本研究更加具有立体感和历史纵深感。

从1984年“农民工”的诞生地乡镇企业,历经异地转移的“民工潮”,再到返乡的“民工荒”,直至第二代“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止于2014年7月30日,国家《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标志着制约“农民工”身份城市化的阶段性成果,也标志着持续中国50余年之久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在走向寿终正寝,标志着一个城乡二元身份时代的结束,一个城乡户籍一体化,城乡身份无差别的时代的到来。

从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农民工”3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农民工”的发展与中国城镇化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农民工”问题的妥善解决,可以更好地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政策导向,可以促进“农民工”问题最终得以彻底解决。“农民工”的前途和最终归宿是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而“农民工”作为中国二元体制下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彻底的产物,最终归于消亡,只留下一个历史概念。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产生的一个新社会群体,其发展历程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史的重要侧面和重要见证。1984年以后,在中国的乡镇企业中诞生了第一批“农民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中“农民工”的诞生,史无前例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经济面貌,给中国农村又一次带来了新希望。随着“农民工”异地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声势浩大的“民工潮”。“民工潮”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中国的二元经济和二元城乡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

在中国二元经济、二元城乡体制这个“双重二元”的条件下,产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农民由乡至城的非农化转移,直接参与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使其本身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内涵,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聚合点,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是劳动力人口的迁移问题,更可以为破解中国“三农”问题寻找突破口,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支点和抓手。

“三农”问题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加大了力度，但问题依然存在，“三农”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非农化转移的不彻底性，使“农民工”“城”而不“化”，成为问题的关键，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

“农民工”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既是中国经济政策变化的产物，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是在新旧体制夹缝中诞生的时代产物。他们一方面是计划经济时期城乡隔离政策的户籍制度的牺牲者，另一方面又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自由流动政策的受益者。由于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在用工制度上，同工不同酬，一厂两制；在社会保障方面，不能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障；在住房方面，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住房补贴；在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或要缴纳高昂的借读费，或只能在办学质量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使第二代“农民工”接受“贫穷遗传”，不能顺利实现向市民转化；“农民工”在社会资源分配等诸方面的劣势，使其只能成为城市的匆匆过客，而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这不仅有碍于城市化的发展，造成中国的“半城市化”，而且大量“农民工”回流返乡，一方面会造成城市的用工短缺，另一方面对农村狭小的人均土地产生冲击。不但城市经济受影响，农村经济也受到波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农民工”又是农民中的精英，由二元体制导致的贫富不均，将难免会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改善其城市生存条件，使“农民工”进得来，而且留得住，能够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将更加有利于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实现完全的市民化，社会消费总需求增加，也会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自古“有恒产者有恒心”，“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破解可以带动“三农”问题的缓解，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的发轫之举。而“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是中国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其根源在于中国的二元经济和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体制。“农民工”的历史使命就是催化和最终完成这种转变。“农民工”由此成为中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二元社会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元社会

体制转变的纽带、桥梁和重要推动力。

对“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问题的解决,盲目借鉴国外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是找不到答案的。中国“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延续性,答案也只能在对历史的详细梳理和现实发展中去寻找。

2. 研究的意义

“农民工”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过去没有,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下的产物;随着“农民工”的市民化,今后也不会再有;国外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同时进行,国外也没有。纵观古今中外,“农民工”现象为中国所特有。对这种特有现象进行研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大战略、大问题,是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和基本之策,通过城镇化可以发掘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同时,推进城镇化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一些重大战略问题,如土地利用问题、户籍改革问题等。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①二元体制下的“农民工”尽管已经实现了职业非农化、地域城市化,但身份仍然是农民,只能是“半城市化”。“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直接制约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中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研究相辅相成,在城镇化视域下,对中国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产物的“农民工”进行深入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解决可以作为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研究“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可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农民工”与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关系;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农民工”成为了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研究“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必然要涉及“农民工”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相应的体制变革和中国式的劳动力转移,其理论成果也可为继续深化改革、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借鉴。

(1) 理论意义。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同步,农民非农化与市民化同步进行。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是分两步走的:先由农民

① 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转变为“农民工”，实现非农化，再由“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实现城市化。^①其根源是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对中国“农民工”职业非农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市民化的研究，可以丰富城市化理论，增加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多样性选择。

“农民工”进城，人口统计上是城市人口，但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待遇，成为“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半城市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对“半城市化”下“农民工”生产的兼业性和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和理论意义。

从城镇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职业非农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市民化几个元素彼此分离、交织，伴随整个过程。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为中国的创举，也有学者称为“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②，是中国“农民工”职业上的非农化。异地转移的外出务工“农民工”，实现了就业地域的城市化。^③尽管“农民工”已经实现了职业上的转换，由农业转换到了非农产业，也由农村迁移到了城市，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被称为“农民工”，其城市身份依然得不到承认。“农民工”的最终城市化要经过身份城市化、人的城市化^④，才能最终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历程的研究，丰富了城市化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外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不同学科纷纷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阐释，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但这种阐释多具有单一学科的局限性，很少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农民工”与城市化相伴而生，“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农民工”城市化问题也不仅仅是个现实的热点问题，有其产生、发展的根源和历史过程。我们只有从纵向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把它作为一个过程，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其规律，并很好地预测其未来，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目前从史学角度对“农民工”城市化问题进行的研究还很少，即使很有限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从经济史的学科角度和城市化的角度对该过程进行的研究则更不多见。本书试图从历

① 简新华：《创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18期。

② 侯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化的历史新解读》，《城市规划学刊》2010年第2期。

③④ 毛哲山：《农民工城市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与趋势》，《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

史学、社会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角度对中国“农民工”城市化做一综合性的尝试性研究,以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2) 现实意义。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在“后危机时代”面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外向出口等约束下的战略性决策。“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①。通过城镇化,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增加了社会总的劳动力供应量;通过劳动力从农业低效率的产业,转移到城市高效率的产业,提高了社会总生产率。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下,“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可以进一步拉大内需。城镇化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善我国产业结构。而第三产业,恰恰又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服务业是就业最大的容器”^②。

在城镇化的视域下,对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可以正确地认识和破解“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和受到的各种阻力,使新型城镇化更有力地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三农”问题、“农业现代化”问题都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可以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农”问题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因此农民的非农化,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目前的二元城乡体制下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和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问题又与城市化、现代化密切相关,“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农民工”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在城市化中找到相应的根据和对策。“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解决,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彻底涤荡计划经济的死角,推动二元城乡体制的一元化。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且涉及国家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的改革,涉及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及城市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选择等问题。“三农”问题的答案在“三农”

① 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② 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人民日报》2014年3月17日,第1版。

之外,“农民工”问题的答案也在“三农”之外。“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枢纽。这一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解决的合理和顺利程度,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经济二元(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体制二元(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双重二元”是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而“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解决,无疑将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着力点和抓手。通过对中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途径的探讨,可以带动中国一系列二元体制问题的解决,如二元教育、二元社保、二元就业、二元财政等等,并逐步实现向以现代经济和市场体制为主导的一元化社会转变。

“农民工”大量流入城市,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外打工的收入回流到家乡,对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是联系城乡、缓解城乡差距、“以工补农”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对“农民工”城市化发展历程的研究,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民工”无疑成为了这一转型进程的重要推动者。研究这一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变革和劳动力转移理论无疑增添了新内容,其成果也可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二、“农民工”城市化的国内外相关研究

1. 国内的相关研究

(1) 对“农民工”概念的界定。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概念的界定不一,但大多认为它是一个歧视性的概念。“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产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的新社会阶层。“农民工”这个词最早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雨林在1984年提出来的。张雨林在《农业经济丛刊》(现名《中国农村观察》)1984年第2期发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城乡结构——江苏省吴江县四个行政村的调查》一文中,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非农化转移的三个层次中,到城市务工的农民,首次使用了“农民工”概念。随后“农民工”一词被广泛使用。

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工”是“农民”的社会身份与“工”的职业相结